

# 东周时期浅腹矮足平盖鼎的风格、产地及相关问题

郎剑锋

(山东大学考古学院)

## 摘要 / Abstract

东周时期,在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等地发现一类整体上特征鲜明的浅腹矮足平盖鼎,根据形制、装饰方面的特征可将其分为不同的型和亚型。综合分析表明,A、B两型浅腹矮足鼎的产地不同,前者产地为薛国或宋国,后者产地以晋国的可能性最大。东周时期主流青铜器铸造工艺随着时代的变迁而演变,但部分地区则较长时期延续较早阶段的工艺传统;青铜器的风格、工艺、物料来源及考古学文化在空间上存在不对应的现象,表明风格圈、工艺圈、物料圈及考古学文化是对不同层面物质文化现象的概括,反映了古代社会的不同方面。

In the Eastern Zhou, a class of low-ventral, low-legged, flat-capped ding tripod with distinct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appeared in Shandong, Shanxi, Henan, Shaanxi and other place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different types and subtypes according to the characteristics of shape and decoration. Th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laces of origin of A and B types of the tripod are different, the former is produced in the state of Xue(薛) or the state of Song(宋), and the latter is produced possibly in the state of Jin(晋). During the Eastern Zhou, the mainstream bronze casting technology evolved with the changes of the time, but some areas continued the earlier technology tradition for a long time. The style, technology, material source and archaeological culture of bronzes do not correspond in space, indicating that the style circle, technology circle, material circle and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re summaries of material cultural phenomena at different levels, reflecting different aspects of ancient society.

**关键词:** 东周; 浅腹矮足平盖鼎; 风格; 产地

**Key words:** Eastern Zhou; Ding Tripod of Low-ventral Low-legged with Flat-capped; Style; Place of Origin

本文系山东大学人文社科重大项目“山东地区古代青铜器综合研究”(21RWZD05)、“泰山学者工程专项经费资助”阶段性成果。

在传世与考古发掘出土的东周青铜器之中，有一类青铜鼎的形制为浅腹，腹壁略弧，圜底近平，三足较矮，口径大于通高，鼎盖为平顶，盖面周边设三曲尺形钮，中部设一近圆形或半圆形钮。此类青铜鼎的数量较少，未引起太多学者的关注，相关的讨论不多，且多局限于地域风格方面的探讨。近年来，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特别是山东枣庄徐楼、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的发掘，此类青铜鼎的数量增多，地域风格的探讨有望进一步深化，器物产地及与之相关的若干问题的讨论也获得了相应的基础。因此，笔者撰文抛砖，希望引起更多学者对此类器物和相关问题的关注与探讨。

## 一、发现概况

笔者共收集此类青铜鼎31件，分布于山东、山西、河南、陕西四省。下面即以省域为界、以时间为序，略述其基本情况。海内外博物馆收藏若干形制相近的青铜器，附于相关器物之后。

### （一）山东（20件）

1978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滕州市薛国故城遗址进行了重点调查勘探，并对尤楼村东2号墓地进行了试掘，共发掘九座周代墓葬。其中，2号墓、4号墓分别出土了7件浅腹矮足平盖鼎，“形制花纹相同，大小依次递减”，报告作者称之为“列鼎”。墓葬的时代，简报作者定为春秋早中期<sup>[1]</sup>；朱凤瀚经过比较研究认为，2号墓、4号墓时代相近，约相当于中原青铜容器分期的第二期第Ⅲ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570年前后<sup>[2]</sup>。

滕州市博物馆也收藏部分薛国故城遗址出土的青铜器，包括一件浅腹矮足平盖鼎，其形制、装饰与薛国故城2号墓、4号墓出土的同类器类似，时代也应相近<sup>[3]</sup>。

1990年，在临淄朱台镇南高阳村东征集到一件保

存完好的同类青铜鼎<sup>[4]</sup>，形制、装饰与上述浅腹矮足平盖鼎相同，时代也当相近。

2009年，枣庄徐楼村发掘了两座周代墓葬，其中1号墓出土了3件浅腹矮足平盖鼎，“形制、纹饰及铭文相同，大小有别”。铭文5行28字，含重文2字，铭文内容为：“有殷天乙汤孙宋公固作濫叔子饋鼎，其眉寿万年，子子孙孙永保用之。”根据文献记载，铜器铭文中的宋公固卒于鲁成公十五年，即公元前576年。因此，M1出土浅腹矮足平盖鼎及墓葬的年代不晚于公元前576年，为春秋中期偏晚阶段<sup>[5]</sup>。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浅腹矮足平盖鼎，形制、装饰与薛国故城、枣庄徐楼出土青铜鼎类似，惜鼎盖已失。该器最初著录于清人刘喜海编纂的《长安获古编》，器形及铭文后经多次著录。陈佩芬认为，“铭文虽自言为庄公的裔孙，然而器形近春秋晚期”<sup>[6]</sup>。董莲池对铭文进行了新的考释，将既往释为“亥”的文字释为“币”，读作“师”，以之为《左传·文公十八年》之“公孙师”<sup>[7]</sup>。鲁文公十八年为公元前609年，故该器时代也处于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 （二）山西（8件）

1975年，闻喜县上郭村采集到一件浅腹矮足平盖鼎，现藏山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平盖上置三矩形钮，盖素面，腹饰两周蟠蛇纹和一周绳索纹。”研究者认为，该鼎时代为春秋中期<sup>[8]</sup>。按其形制、装饰与隰县瓦窑坡墓地出土浅腹矮足平盖鼎近同，时代也应相当，并为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1976年，文物工作者对上郭村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发现了5座周代铜器墓。其中，17号墓出土了一件浅腹矮足平盖鼎，编号为76M17:6。作者根据青铜器的组合及陶鬲形制判断，17号墓的时代可定在春秋中期偏晚，不晚于公元前6世纪上半叶<sup>[9]</sup>。

2000年，文物工作者对乡宁县嘉父山墓地进行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墓葬33座。其中，4号墓、6号墓分别出土一件浅腹矮足平盖鼎，编号为M4:6、

M6:7。作者认为,这两座墓葬的年代为春秋中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约为公元前650年以后<sup>[10]</sup>。按其形制、装饰与山西其他地点出土同类器相同,时代应相近,为春秋中期偏晚阶段。

2005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对隰县瓦窑坡墓地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发掘墓葬17座,包括11座出土大量青铜器的墓葬。其中,18号墓出土的编号为M18:1的青铜鼎和30号墓出土的编号为M30:16、M30:18、M30:34的青铜鼎的口径大于通高,可归入浅腹矮足平盖鼎。墓葬的时代,发掘者定为春秋中期偏晚阶段,绝对年代在公元前600年左右<sup>[11]</sup>。

### (三) 河南 (2件)

2005年,洛阳市西工区发掘清理了一批东周墓葬,其中8830、8832号墓保存较好,出土了较多随葬品。前者包括5件青铜鼎,形制、装饰多不相同。其中,编号为M8830:4的青铜鼎,“器身扁宽,子口承盖,盖已失”,“三蹄形足较粗短”。鼎腹内壁有铭文,共计9行,部分文字漫漶不清。后者出土形制与装饰不同的8件青铜鼎。编号为M8832:5的青铜鼎为一件浅腹平盖鼎,“中空三蹄足较矮”,为一件典型的浅腹矮足平盖鼎。两座墓葬的时代,发掘者认为,应属于春秋中期<sup>[12]</sup>。

### (四) 陕西 (1件)

2003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凤翔县孙家南头西一带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共清理周、秦汉以后墓葬和车马坑191座。其中,160号春秋秦墓出土了3件青铜鼎。其中,A型鼎1件,编号为M160:7,该器“敛口,方唇,子母口,附两方耳,圆鼓腹,腹中部有一周凸棱,底近平,三蹄足。耳内外侧及腹部上下均饰蟠虺纹,凸棱上刻划细斜线。表面锈蚀,器壁较薄”。该器口径25.2、通高24.3厘米,也属于浅腹矮足平盖鼎。墓葬属于墓地分期第二期,时代为春秋中期<sup>[13]</sup>。

## 二、风格分析

“风格”是艺术史的核心概念,“是指作品中所表现的独特面貌。它可大可小,大到一个时代一个民族,小到一个艺术家一群艺术家,而且总是与艺术作品的形式联系在一起”<sup>[14]</sup>。或简言之,“风格是指艺术品形式上的特征”<sup>[15]</sup>。随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会”,“风格”概念被引入考古学界,用于开展商周青铜器的分析研究<sup>[16]</sup>。

上述诸器,就其“形式上的特征”而言,具有明显的相似性。这一点此前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如赵瑞民、韩炳华指出,1975年闻喜县上郭村采集青铜鼎的形制、纹饰与山东滕州薛国故城M4:30及M2:104青铜鼎相似,主张此种风格的青铜鼎是东周时期滕州地区的特色器物<sup>[17]</sup>。路国权对包括此类青铜鼎在内的东周青铜器进行了系统的类型学分析,揭示出此类青铜鼎的时空分布状况<sup>[18]</sup>。毕经纬等虽将薛国故城2号墓等出土的浅腹矮足平盖鼎与长清仙人台5号墓、济南左家洼出土齐式鼎划分为同一类型,但也注意到三者之间的差异,指出“盖由平变隆”“蹄足渐高”等演变趋势<sup>[19]</sup>;“此类鼎还见于山西闻喜上郭村76M17:6,时代也相当,其源头不甚清楚”<sup>[20]</sup>。张洁、刘艳菲将枣庄徐楼和滕州薛故城出土浅腹平盖矮足鼎归入“中原文化因素”,但同时指出,“器物形制比较特殊,在中原地区比较少见”<sup>[21]</sup>。考古资料的积累,特别是隰县瓦窑坡墓地同一风格青铜鼎的出土,引发研究者对此类青铜鼎在风格细节方面差异的关注,指出“瓦窑坡M30出土铜鼎与枣庄徐楼村M1出土带宋公固铭文的铜鼎腹部形制较相似,只是山东出土的此类铜鼎足十分粗矮”<sup>[22]</sup>。

笔者认为,瓦窑坡墓地与枣庄徐楼出土浅腹矮足平盖鼎的区别,不仅体现在鼎足的粗细方面,还体现在青铜鼎的装饰方面——前者纹饰细密,吐舌龙纹为单首,身体呈“C”形,不同龙纹之间相互连接;后

者纹饰较粗犷，吐舌龙纹大多为双首，身体呈“S”形，不同龙纹相对独立，未相互连接在一起。根据以上两方面的差异，可将浅腹矮足平盖鼎分为两型。

A型，22件。蹄足粗壮，纹饰较粗犷。根据纹饰的布局或形制，又可将A型浅腹矮足平盖鼎进一步分为三个亚型。

Aa型，13件。纹饰带较窄，仅限于上腹部。

标本一，枣庄徐楼1号墓出土，编号M1:39。器口微敛，子母口，方唇，浅腹，腹壁微鼓，圜底近平，三蹄足十分粗壮。盖平顶，上附三个矩形钮和一个半环钮<sup>[23]</sup>。上腹部饰一周吐舌龙纹，下缘以一道凸棱为界。口径32.8、腹深12.4、通高26厘米（图一，1；图二，1）。同墓出土的另外两件青铜鼎形制、装饰与此相同，大小有别。

标本二，滕州薛国故城4号墓出土，编号M4:30。子母口，圜底近平，腹微鼓，蹄足较粗，附耳，平盖，盖面附三矩形钮和一半环形钮。器盖及腹部饰吐舌龙纹，下缘以一凸棱为界。七件列鼎的形制、纹饰相同，大小有别，其中编号为M4:30的青铜鼎，口径28.5、通高27厘米（图一，3）<sup>[24]</sup>。

标本三，洛阳体育场路西8832号墓出土，编号M8832:5。形制与上述标本相似，矩形钮上装饰“S”形纹，盖面饰一周夔龙纹带，器耳内均饰“S”形纹，腹部饰一周吐舌龙纹。口径24、通高22.8厘米（图一，2；图二，2；图三，1）。

临淄朱台镇南高阳村征集、滕州市博物馆收藏的浅腹矮足平盖鼎也属于该型，形制、装饰与上述标本近同。前者盖、腹均饰龙纹，腹部纹饰下缘以纆索纹为界，耳饰“S”形纹，口径27.2、通高25.7厘米（图三，2）；后者磨损严重，出土时鼎内发现羊骨，口径27.2、通高25.7厘米。

Ab型，8件。纹饰带较宽，纹饰同时覆盖上腹部和下腹部。

标本一，滕州薛国故城2号墓出土，编号M2:104。子母口微敛，厚方唇，腹微鼓，圜底近平。盖顶设三

矩形钮和一半环钮。盖鼎饰龙纹，上腹部饰吐舌龙纹，下腹部饰垂鳞纹，以纆索状凸棱为界，器耳外侧饰“S”形纹。该器口径38、通高32厘米（图一，4）。

标本二，上海博物馆收藏。两耳与器身对应位置各有两个短梗相连，上腹部饰吐舌龙纹，下腹部饰垂鳞纹，中间以凸棱相隔。口径21.0、通高15.6厘米（图三，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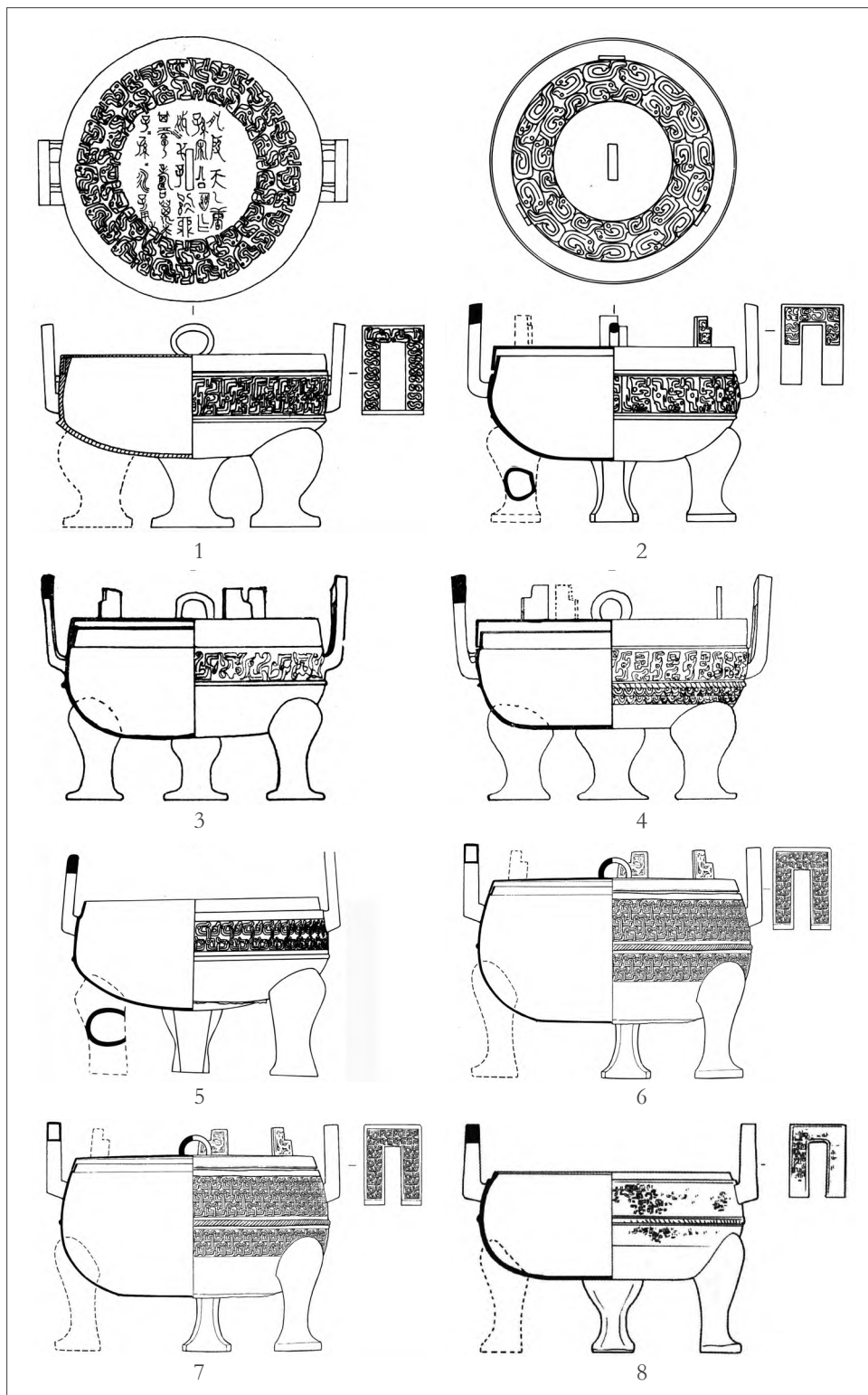
Ac型，1件，出土于洛阳体育场路西M8830，编号M8830:4。该器纹饰较窄、较粗犷，但吐舌龙纹为单首，身体呈“C”形，当是受到了B型浅腹矮足平盖鼎装饰风格的影响，装饰风格具有一定的混合性。该器口径28、通高27.1厘米（图一，5；图二，5）。

B型，9件。蹄足较细，纹饰细密。

标本一，隰县瓦窑坡18号墓出土，编号M18:1。子母口，浅腹，器身扁平，鼓腹，下腹内收，圜底近平，三蹄形足较粗。平盖设三个曲尺形钮和一近环形钮。青铜鼎的上腹部及下腹部分别装饰三层、两层细密的吐舌龙纹，中间以纆索状凸棱为界，鼎耳内外两侧均饰细密几何化蟠螭纹；盖面饰三重同心圆状的细密龙纹，中间以素面条带相隔，三个曲尺形盖钮饰张口顾首龙纹。口径26.4、腹深14.6、通高25.8厘米（图一，6）。

标本二，隰县瓦窑坡30号墓出土，编号M30:16。形制、腹部、耳腹、盖钮装饰与标本一近同，盖面从内向外装饰龙纹、三角纹和两道蟠螭纹，中间以素面条带相隔。口径27.6、通高26.2厘米（图一，7；图二，3）。

山西闻喜上郭村76M17出土、上郭村采集、乡宁嘉父山4号墓和6号墓、陕西凤翔孙家南头160号墓出土的浅腹矮足平盖鼎形制、装饰与上述标本近同，也应属于此型。上郭村76M17出土青铜鼎编号76M17:6，口径19.4、腹深9.0、通高18.4厘米。上郭村采集器，尺寸不详。乡宁嘉父山4号墓出土青铜鼎编号M4:6，盖径23.8、通高22.1~22.3厘米，6号墓出土青铜鼎编号M6:7，盖径24.6、通高21.8厘米。孙家南头160号墓浅腹矮足平盖鼎，编号M160:7，



图一 浅腹矮足平盖鼎（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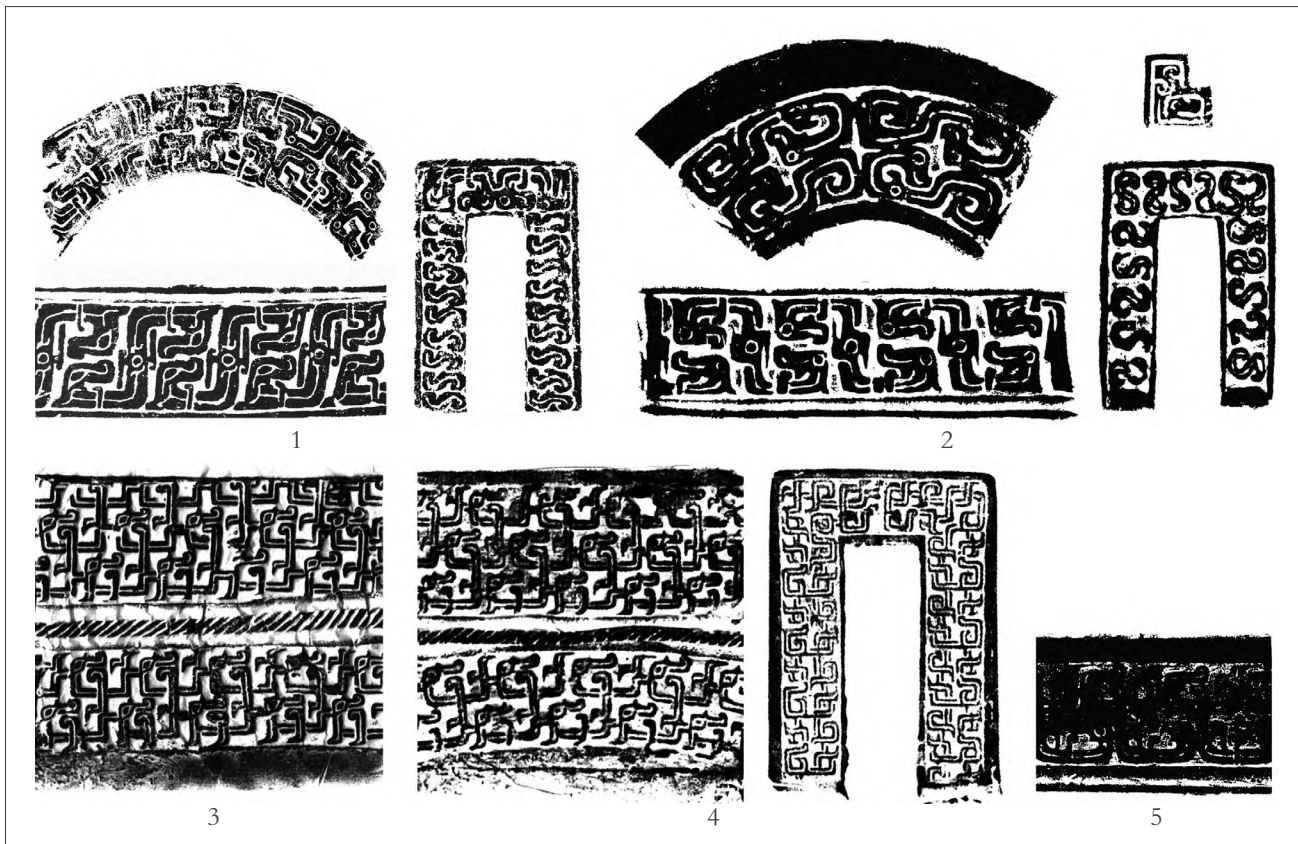
1~3.Aa型（山东枣庄徐楼 M1:39、河南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5、山东滕州薛国故城 M4:30） 4.Ab型（山东滕州薛国故城 M2:104） 5.Ac型（河南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0:4） 6~8.B型（山西隰县瓦窑坡 M18:1、山西隰县瓦窑坡 M30:16、陕西凤翔孙家南头 M160:7）

顶盖佚失。口径 25.2、腹深 11.7、通高 24.3 厘米（图一，8）。

上述两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风格差别明显。其中，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0 出土的 Ac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装饰风格具有一定的混合性，表明 A、B 两型浅腹矮足平盖鼎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现象。

### 三、产地探讨

此前，研究者论及此类青铜器的产地问题时，主要通过形制特点、时空分布进行了推测。如赵瑞民、韩炳华在论及 1975 年闻喜上郭村采集的 B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时认为，“这种粗蹄形足，平盖，直腹，近平底的样式是东周时期山东滕州地区地方特色鲜明的器物。此物有可能是一件薛国器”<sup>[25]</sup>。路国权认为，此类青铜鼎在东周第二期时主要分布在山东滕州、临淄和河南洛阳等地，分属滕国、齐国和周王室；第三期核心区位于山东西南部（滕州、枣庄），



图二 青铜鼎拓片

1. 山东枣庄徐楼 M1:39 2. 河南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5 3. 山西隰县瓦窑坡 M30:16 4. 山西隰县瓦窑坡 M30:17 5. 河南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0:4



图三 浅腹矮足平盖鼎 (二)

- 1~2.Aa 型 (河南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5、山东临淄朱台镇南高阳村征集) 3.Ab 型 (上海博物馆收藏)

158 离散分布区包括山西南部 (闻喜)、陕西关中 (凤翔) 等地, 分属晋国、秦国; 第四期之后该型青铜鼎消失不见。此类青铜鼎的核心分布区位于山东西南部的枣

庄、滕州及其周边地区, 认为此类青铜鼎应为枣庄、滕州、商丘、彭城一带的特色器物<sup>[26]</sup>。张洁、刘艳菲根据枣庄徐楼出土青铜鼎铭文推断, 这种形制的青铜

鼎可能均为宋国器物<sup>[27]</sup>。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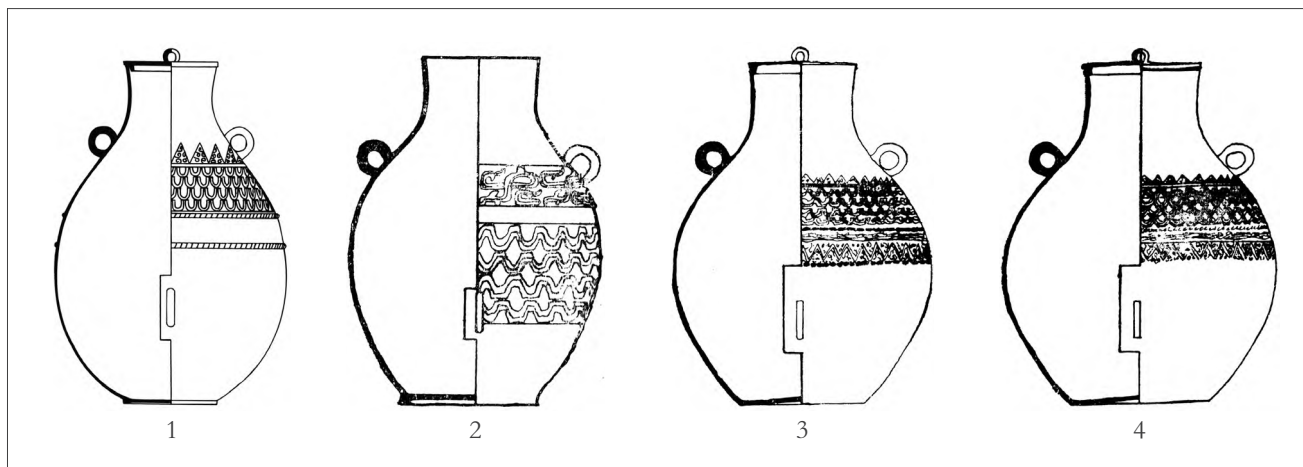
青铜器的产地问题，与器物的生产和流通直接相关，对于考察当时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不同地区间的政治和经济联系、文化交流、人员往来等问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sup>[28]</sup>。近年来，有若干学者对青铜器产地研究方法进行了总结，如白云翔先生提出了“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认为“产地形成产品风格，流通形成产品分布”。因此，“可以根据具有不同风格的考古遗物的空间分布推定它们的产地”，认为“考古遗物的密集分布区就是其产地所在”<sup>[29]</sup>。曹大志指出，青铜器的“风格”，除了形制、装饰之外，还可以包括青铜器制作技术的特点；青铜器的产地研究应重视器物出土相关信息，结合考古背景、铜器风格、原料来源等方面的信息对青铜器产地进行综合判断<sup>[30]</sup>。黎海超等也强调，探讨青铜器的产地，不仅要分析青铜器的风格，还要关注器物的质量特征、原料特征，实现“形”“工”“料”的全面考察，认为如果青铜器的“形”“工”“料”等均具有地方特征，则可判断其为当地生产<sup>[31]</sup>。此外，也有学者尝试通过分析青铜器残存的陶范和泥芯物相、岩相和成分特别是稀土元素探讨青铜器的产地问题<sup>[32]</sup>。但需要指出的是，青铜器的产地研究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因此白云翔先生强调，“在考古遗物的产地研究上，任何一种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因此，需要多种方法的综合运用和相互印证，尤其是与科技考古方法有机地结合”<sup>[33]</sup>。根据上述学者的讨论，笔者拟从青铜器的风格与分布、考古背景、青铜器铸造工艺等方面信息，综合考察此类浅腹矮足平盖鼎的产地问题。

风格方面，此类青铜鼎的整体特征鲜明，较易与同时期其他类型的青铜鼎进行区别。因此，前文所述学者在相关研究中才将其单独列为一型；但在鼎足、装饰等细节方面还存在一定的差异，笔者以之为据，将其划分为A、B两型。空间分布方面，此类青铜鼎主要分布于黄河流域。具体而言，A、B两型的分布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A型主要分布于山东、河南，

B型分布于山西、陕西，二者的分布可谓泾渭分明；就其分布密度而言，滕州、枣庄所在的鲁西南和毗邻的豫东地区，应为A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密集分布区，临淄、洛阳等地为一般分布区或离散分布区；隰县、闻喜县、乡宁县所在的晋西南为B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密集分布区，陕西凤翔为一般分布区或离散分布区。据此可以推断，A、B两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产地应该存在差异，A型产地应为鲁西南及豫东地区，B型产地为晋西南地区。

考古背景方面，A型浅腹矮足平盖鼎涉及薛国、宋国、齐国和东周时期周王室所在的王都，其中薛国、宋国出土的浅腹矮足平盖鼎均为成组出土，表明了其在当地礼仪制度、礼仪生活中所占核心地位；齐地和东周王都的浅腹矮足平盖鼎仅为零星出土，且与同出的“列鼎”或当地主流的风格青铜鼎在形制、装饰方面存在明显差异，为外来输入的可能性很大。

除1件A型浅腹矮足平盖鼎之外，洛阳体育场路西8832号墓还出土了与滕州或山东其他地区风格相同或相似的青铜圆壶、青铜盖鼎各一件<sup>[34]</sup>。青铜圆壶编号M8832:15，子口微侈，短束颈，圆鼓腹，矮圈足，颈两侧及下腹部一侧设环形钮；盖面平顶，中间设一环钮。上腹部饰几何三角纹、垂鳞纹带和两周绶索状凸棱纹(图四,1)。此种青铜壶在洛阳地区少见，形制、装饰却与滕州薛国故城1号墓、2号墓、4号墓出土的Ⅱ式青铜壶非常接近(图四,2~4)。有研究者指出，此类青铜壶在山东长清仙人台M6、招远曲城等地也有发现，可能具有渊源关系<sup>[35]</sup>。青铜盖鼎编号M8832:11，子母口微敛，鼓腹，圜底，三蹄足，双附耳；鼎盖平顶，周沿下折，盖面对称设置四个卧兽形钮。腹部饰窃纹、三角纹，盖面及周沿饰几何形云纹(图五,1)。类似风格的青铜鼎在其他地区出土数量极少，但在山东滕州薛国故城<sup>[36]</sup>、曲阜林前村711号墓(图五,3)<sup>[37]</sup>、临沂义堂城子<sup>[38]</sup>、海阳嘴子前4号墓(图五,2)<sup>[39]</sup>、临淄<sup>[40]</sup>等地已发现多件，其为山东地区产品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洛阳体育场路西8832号墓



图四 相关青铜壶

1. 河南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15 2.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 M1:63 3.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 M2:124 4.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 M4:6

出土滕州或山东风格的青铜圆壶、青铜盖鼎，支持该墓出土 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为鲁西南输入品的观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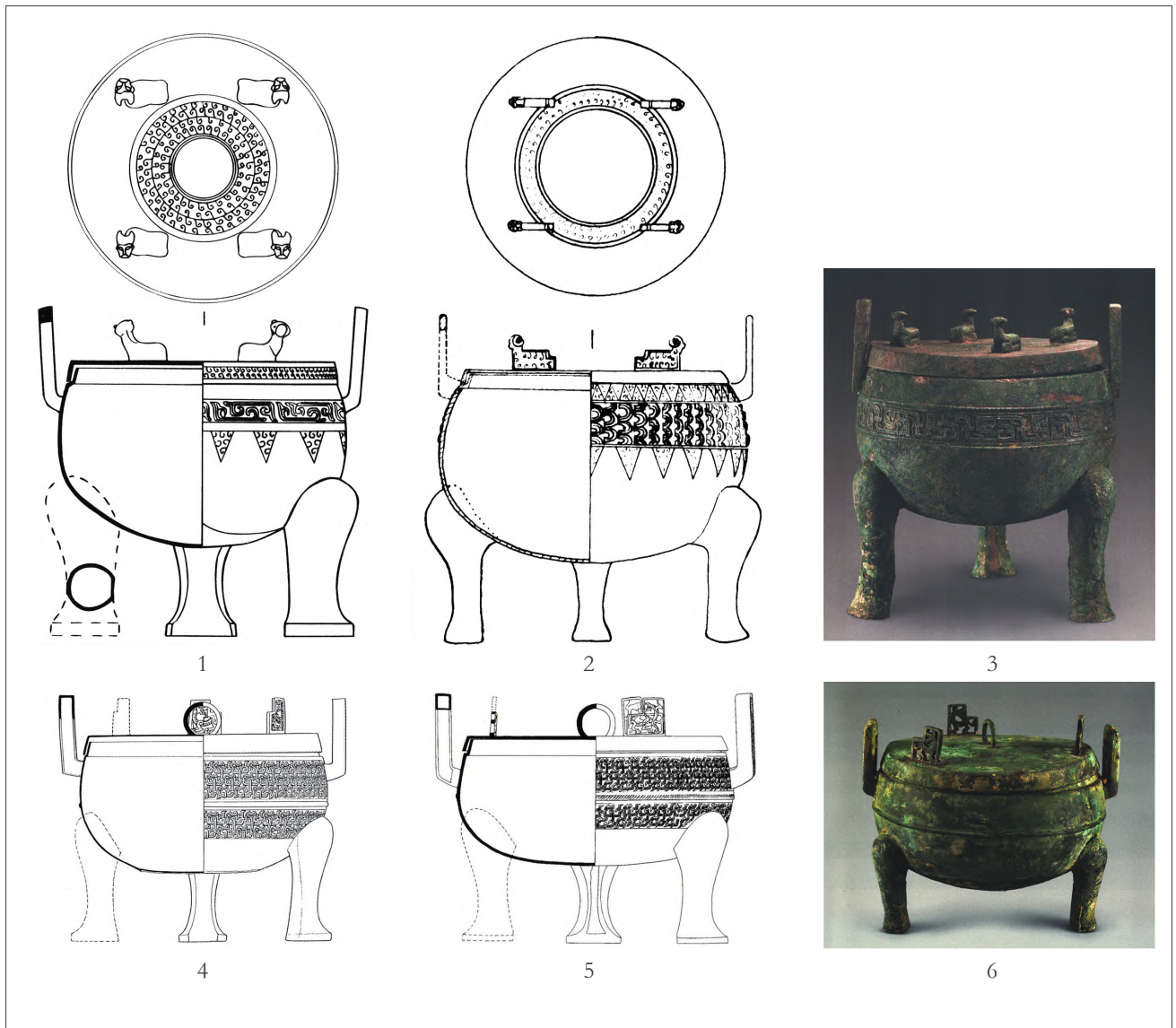
B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涉及晋、秦两国，晋地隰县瓦窑坡 18 号墓出土的 3 件青铜鼎，“形制、纹饰相近”，30 号墓出土的 5 件青铜鼎“形制、纹饰基本相同，大小相次”。前举浅腹矮足平盖鼎与同出青铜鼎的区别在于口径与通高的比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口径大于通高，其他青铜鼎的口径等于或明显小于通高。如此，前者整体形态略宽扁，呈横长方形；后者整体形态近方形或竖长方形。如隰县瓦窑坡 18 号墓出土的 M18:2、M18:3，与 M18:1 形制相似，装饰相同，但前者尺寸分别为口径 23、通高 24.5 和口径 21.5、通高 22.6 厘米，口径小于通高（图五，4）；隰县瓦窑坡 30 号墓出土的 M30:17 青铜鼎，与 M30:16 等浅腹矮足平盖鼎形制相似，装饰相同，但口径 23.7、通高 23.6 厘米，口径与通高约略相等（图二，4；图五，5）。乡宁县嘉父山墓地 4 号墓、6 号墓均出土 3 件青铜鼎，其中 4 号墓出土的 M4:6 青铜鼎与同出的另外两件青铜鼎在形制、装饰方面风格迥异；6 号墓出土的 M6:3、M6:7 形制相近，装饰相同，但前者盖径 24.6、通高 24.3~24.6 厘米，整体近方形，后者盖径 24.6、通高 21.8 厘米，整体呈横长方形。上述二鼎与

编号为 M6:4 的青铜鼎形制、装饰风格存在明显差异。此外，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 2015 年发掘的 2 号墓出土的编号为 2015M2:3、2015M2:6 的青铜鼎，形制与 B 型浅腹平盖鼎略近，当是受到了 B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影响，但二者通体素面，口径略小于通高，前者口径 20、通高 25.5 厘米，后者口径 18.7、通高 20 厘米（图五，6）<sup>[41]</sup>。上述现象表明，晋地的 B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与非浅腹矮足平盖鼎虽然在形制特征上存在差异，但在装饰及礼制层面并未形成明显的区隔，而是有机地融合在一起，共同形成等级身份的标识。秦地仅出土了 1 件 B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且其风格与秦系青铜鼎差异明显，应该也是外来输入品。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进一步推断，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产地应为薛国或宋国，B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产地为晋国的可能性非常大。

铸造工艺方面，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此前尚未开展系统研究，但简报的文字和图录提供了部分铸造工艺方面的信息，辅以典型器物的观察，可以明确其铸造工艺。如枣庄徐楼简报披露，三件 A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底部可见明显的铸造痕迹，器身系用 3 块范合铸”<sup>[42]</sup>。编号为 M1:39 的青铜鼎照片显示，蹄足正中的范线清晰，向上延伸至下腹部，上腹部对应位置





图五 相关青铜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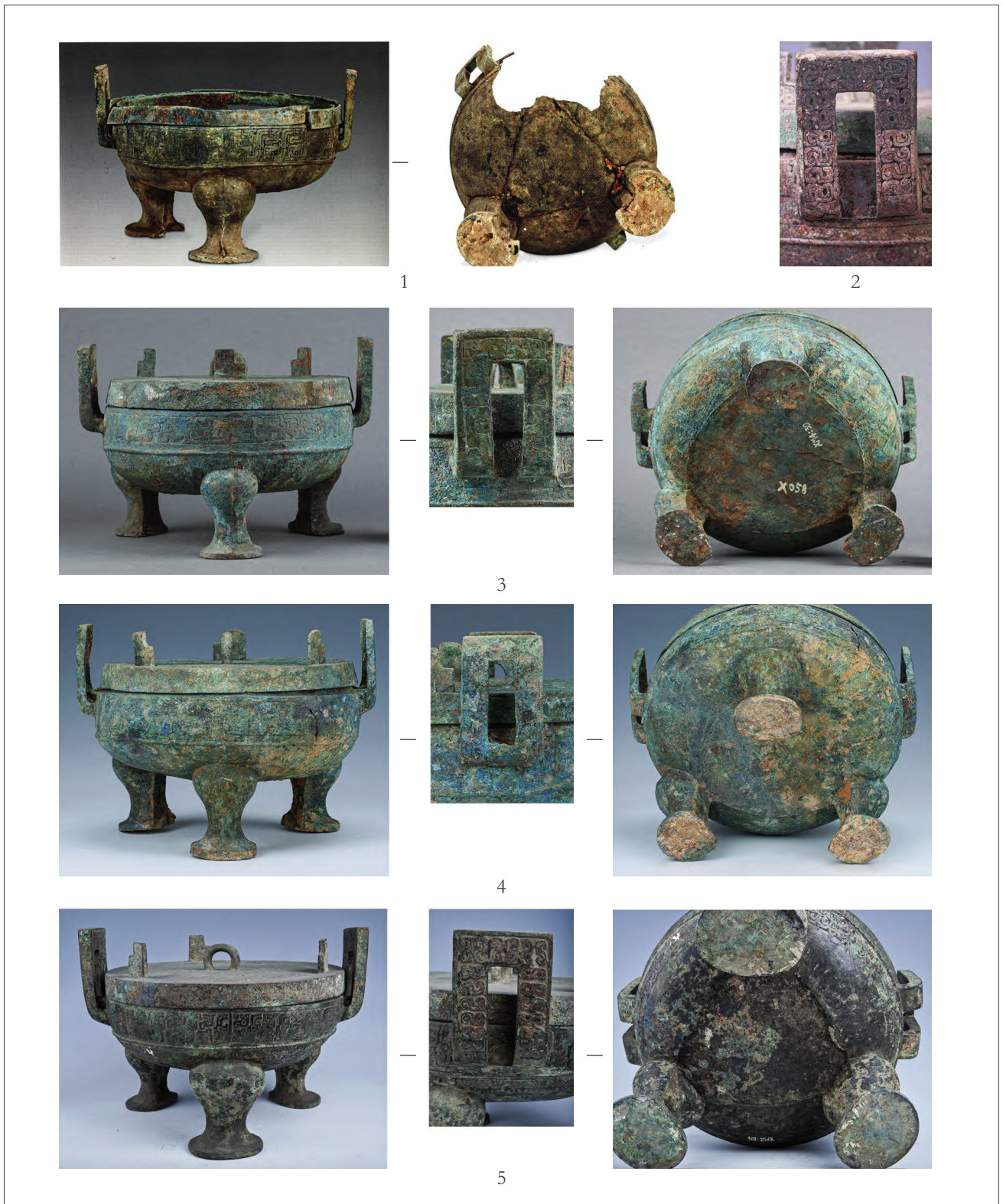
1. 河南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11 2. 山东海阳嘴子前 M4:90 3. 山东曲阜林前村 M711 出土 4. 山西隰县瓦窑坡 M18:2 5. 山西隰县瓦窑坡 M30:17 6. 山西襄汾陶寺北 M2:6

的纹饰有错位现象；底范呈三角形，范线清晰；双耳内侧与口沿对应位置各有两条短梗相连。通过上述信息可以判断，该器为浑铸成形，铸型为三块腹范、一块三角形底范和一块腹芯组成（图六，1）<sup>[43]</sup>。

滕州薛国故城 M4 出土的 A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耳部与上腹部相对位置，素面无纹，上腹部纹饰中断；腹部三分范线与鼎足正中相对，底范近圆形，推定其

为浑铸成形<sup>[44]</sup>（图六，3）。滕州博物馆收藏的 A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鼎足正中范线向上延伸至鼎腹，三角形底范也接近圆形，与薛国故城 M4 出土的同类器相同，鼎耳与腹部对应位置有短梗相连，可以进一步明确该青铜鼎为浑铸成形（图六，4）。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 出土的 A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鼎底有明显的铸造痕迹，从铸痕可以看出



图六 青铜鼎铸造工艺（一）

1. 山东枣庄徐楼 M1:39 2. 山东临淄朱台镇南高阳村征集 3.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 M4:30 4. 山东滕州市博物馆收藏 5. 山东滕州薛国故城 M2:104

器身是由三块外范合铸而成”<sup>[45]</sup>。通过观察简报发表的器物照片可以发现，鼎足正中的范线明显，并且向上一直延伸至鼎腹。据此可以推断，该鼎也是浑铸成形，铸型也是由三块腹范、一块三角形底范、一块腹芯组成。

临淄征集的 A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底部有三角形合范痕”<sup>[46]</sup>，上腹部纹饰在鼎耳位置发生断裂，上腹部鼎耳对应位置为素面，且有明显的浑铸成形留下的范线（图六，2），推测鼎足、鼎耳也应是浑铸成形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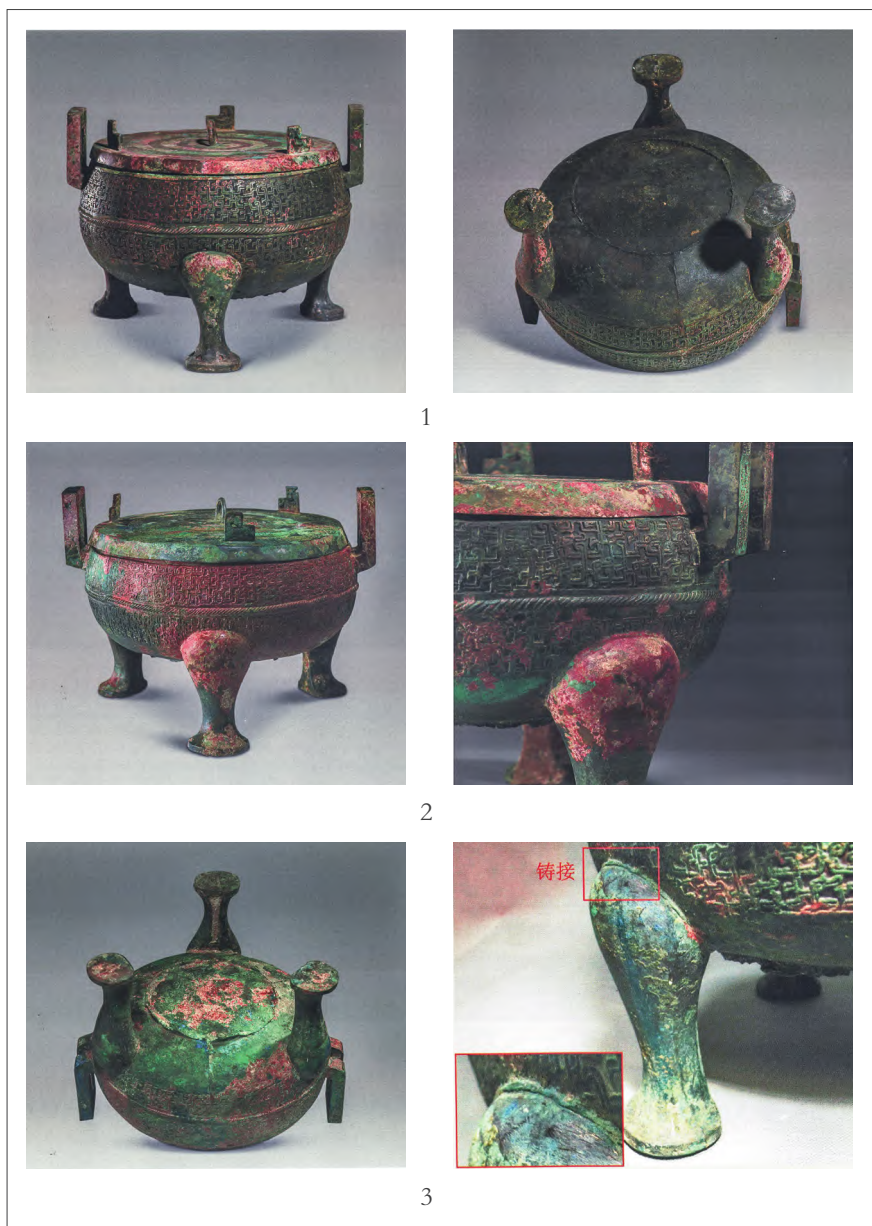
滕州薛国故城 M2 出土的 Ab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腹部三分范线向下延伸至鼎足正中，鼎耳与上腹部相对位置素面无纹，且有短梗与上腹部相连，可以明确其为浑铸而成；底范清晰，平面呈三角形，范线三角与三足内侧范线相连，可以判断三足也是浑铸成形（图六，5）。

上海博物馆藏 Ab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器表打磨光滑，范线不明，底范为三角形，双附耳各有两条短梗与上腹部相连，推断鼎耳也应为浑铸成形。

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0 出土的 Ac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鼎底有明显的铸造痕迹，从铸痕可以看出器身是由三块外范合铸而成”<sup>[47]</sup>。该器锈蚀较为严重，照片显示的腹部范线并不清晰，但

根据报告对其铸造工艺的描述文字来看，与洛阳体育场路西 M8832 出土的 Aa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近同，推测 Ac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为浑铸成形的可能性较大。

通过上面的分析基本可以明确，Aa 型、Ab 型、Ac 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铸造技术是一致的，均使用



图七 青铜鼎铸造工艺（二）

1. 山西隰县瓦窑坡 M18:1 2. 山西隰县瓦窑坡 M18:2 3. 山西隰县瓦窑坡 M30:17

浑铸成形的制作方法而成。

B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特别是隰县瓦窑坡新出土浅腹矮足平盖鼎的铸造工艺已有专门研究。研究者指出，瓦窑坡M29、M30出土青铜器中，青铜鼎的盖钮、附耳、鼎足均为先铸，再与器身进行铸接（图七，3）<sup>[48]</sup>。M18出土的青铜鼎，简报作者认为，“鼎耳与鼎上腹相接处为素面，可知鼎耳先铸鼎身后铸”，“鼎足上部压在鼎身纹饰上，可知鼎足是在器身成形后再次浇铸的”<sup>[49]</sup>。后者暗示，鼎足为后铸铸接，与M29、M30的研究结论相悖。通过观察器物照片，可见底范为圆形，腹部三等分位置各有一条范线，与三足相间分布；鼎耳为器腹铜液包裹，推断，鼎足、鼎耳可能均为先铸，然后再通过嵌铸与器身进行铸接（图七，1、2）<sup>[50]</sup>。

乡宁县嘉义山4号墓、6号墓出土的B型浅腹矮足平盖鼎，“底部和足部对接缝及铸缝都很明显”，“腹底铸缝明显”<sup>[51]</sup>。上郭村76M17出土的B型浅腹矮足平盖鼎，“铸痕显示其外范为3块腹范、1块圆形底范”<sup>[52]</sup>。青铜鼎的铸造工艺应与隰县出土的B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相同。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明确，A、B两型浅腹矮足平盖鼎在铸造工艺上判然有别，内部则表现出高度的一致性。因此，基于风格、空间分布、考古背景、铸造工艺等方面的信息，对其产地的分析判断是一致的。由于A、B两型浅腹矮足平盖鼎时间接近，且集中于春秋中期偏晚阶段，浅腹矮足平盖鼎的起源及A、B两型浅腹矮足平盖鼎之间的关联还需要作进一步思考与关注。

#### 四、相关问题

下面结合上述研究结论，对东周时期青铜铸造工艺的变迁与延续，青铜器的风格、工艺、物料与考古学文化关系问题略作讨论。

#### （一）东周时期青铜器铸造工艺的时代变迁与区域延续

古代中国青铜器的技术特征首先表现为主要采用泥范分范合铸成形的方法，春秋中期以前几乎是唯一的铸造工艺，春秋中期以后也处于绝对统治地位，失蜡法与锤锻成形者寥寥无几<sup>[53]</sup>。其中，范铸技术在春秋中期以前以浑铸成形为主；春秋中期以降，特别是偏晚阶段以后，分铸技术发展成熟，较为复杂的青铜器多采用分铸技术，特别是占据青铜礼器核心地位的青铜鼎，鼎足或鼎耳等附件均为分铸，与之相应的圆形底范形成，并在大范围内广泛应用，成为新的时代潮流<sup>[54]</sup>。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和相关研究的增多，这一判断得到越来越多研究成果的印证<sup>[55]</sup>。

但笔者发现，东周时期也有不少国家和地区，特别是地处山东地区的诸国，青铜鼎的铸造工艺比较长期地延续了较早阶段的技术传统。如以沂水刘家店子、沂水纪王崮墓葬为代表的莒国青铜器，时代为春秋中期偏晚阶段。两墓出土的40余件青铜鼎，全部使用浑铸法铸造而成，铸型延续了此前三块腹范、一块三角形底范和一块腹芯的分范技术<sup>[56]</sup>。

位于济南长清五峰山街道北黄崖村的仙人台墓地为周代邾国贵族墓地。春秋中期偏晚阶段的4号墓，出土的5件青铜鼎全部为浑铸成形<sup>[57]</sup>。年代略晚的5号墓，出土了三件列鼎，鼎腹较浅，弧腹，圜底近平的特点与本文所论青铜鼎相近，但三足瘦高，与本文所论青铜鼎差异明显，装饰亦不同，但同样都采用了浑铸成形的铸造工艺<sup>[58]</sup>。

临沂凤凰岭东周墓，墓葬规模巨大，结构复杂，由墓室、器物坑、车马坑组成。墓葬的时代为春秋晚期偏早阶段，墓主为邾国国君<sup>[59]</sup>。该墓早年被盗，劫余出土10件青铜鼎。其中，Ⅱ式鼎9件，为形制及装饰相近、大小相同的附耳铜鼎。铸型为对开双外范，无底范，鼎足先铸，但鼎耳仍为浑铸，铸造工艺整体呈现过渡阶段的特点<sup>[60]</sup>。凤凰岭墓出土的Ⅰ式鼎，双立耳，半球腹，圜底，三蹄足，“三足皆残断再次接

铸”。通过器物照片可以发现，该鼎范线清晰，腹范三分，向下延伸至鼎足，底范为三角形，鼎耳未见分铸痕迹<sup>[61]</sup>。据此可以判断，该器应为浑铸成形，铸型为三块腹范、一块底范、一块腹芯组成。

与上述诸国青铜鼎主体仍延续浑铸成形工艺不同，地处长江下游的吴越地区，东周晚期的青铜鼎，同时存在浑铸、分铸两种铸造工艺，后者在器腹的分型方面还存在差异。这种现象表明，吴越地区东周晚期可能存在不同的匠人集团或铸铜作坊<sup>[62]</sup>。而地处中原西北方向的秦国，在春秋战国时期，青铜鼎至少部分保留了浑铸成形技术，但铸型改为较为少见的水平对开分范<sup>[63]</sup>。

可见，东周时期青铜器主流铸造工艺随时代演进发生整体变迁，但部分区域则延续较早阶段工艺传统，形成了不同铸造工艺共存的现象。

## （二）青铜器风格、工艺、物料圈与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

就整体风格而言，本文所论的浅腹矮足平盖鼎具有较为明显的相似性，可以划分为同一风格；但根据鼎足及装饰细节，浅腹矮足平盖鼎又可以划分为A、B两型。因此，根据浅腹矮足平盖鼎的分布范围，可以勾勒出一个较大范围的风格圈，这一风格圈主要涵盖了晋西南和豫东—鲁西南两个地区；上述区域又可根据青铜鼎的细部特征，划分为两个较小的次级风格圈。对铸造工艺的考察表明，浅腹矮足平盖鼎的A、B两型、两个次级风格圈与两种截然不同的铸造工艺正相对应，前者采用浑铸技术，后者则主要采用分铸技术，可分别称为“浑铸技术圈”和“分铸技术圈”。

张吉等对青铜器物料特别是铅料的大量研究表明，东周时期的中原、汉淮与海岱等广大地区，在青铜器生产过程中对铅料应用大体一致，并保持了同步变化更新。具体而言，东周时期上述广大地区铅料的使用分别在春秋早中期之际、春秋中晚期之际和春秋战国之际发生了三次变化，分别主要使用B类、C0类、

C2类铅料<sup>[64]</sup>。如此，呈现出一个以铅料为代表的、范围更广大的“物料圈”，该圈同时涵盖了多个不同的青铜器风格圈和工艺圈。这一现象或者表明，与青铜器的风格、工艺相比，物料的流通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和更强的穿透性，从而在更大范围内跨越了器物风格和工艺技术的边界。

本文所论浅腹矮足平盖鼎是一种具有特殊形制和装饰风格的器物，仅可视为某一考古学文化的“一种特征”，尚不能据此将工艺圈、物料圈与考古学文化进行直接联系。因为“考古学文化”是基于物质遗存时代性、地域性特征的专门术语，强调物质遗存的群体性特征。如安志敏先生所言，“一个文化不能由一种特征来划分，因为在不同的文化中可能找到类似的文化因素。只有许多特征的总和，才能把一个文化和另一个文化划分开来”<sup>[65]</sup>。黎海超等人的研究，明确将物料圈与考古学文化特别是历史时期考古学文化联系在了一起。其对巴、蜀青铜器的研究表明，虽然两国青铜器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具有极强的相似性，但两国青铜器却表现出完全不同的微量元素特征，表明巴、蜀两国青铜器原料类型不同；铅同位素比值同样差异明显，进一步证实了基于微量元素特征所得的结论<sup>[66]</sup>。在上述案例中，巴蜀文化这一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同时涵盖了两个不同的青铜器物料圈。

通过上述分析不难得出如下结论：器物的风格圈、技术圈、物料圈与考古学文化，是对不同层面物质文化现象的概括，应与古代社会不同方面的问题相关，其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如徐良高先生所言，“青铜礼器是典型的集技术、器用、制度与思想观念于一身的物质文化遗存，具有物质器用、制度象征和观念信仰体现三种身份和意义，既是技术水平的集中体现，又是社会组织与观念信仰的物化形式”；“‘青铜礼器文化圈’涵盖了多个以陶器为标准划分的考古学文化区系类型”<sup>[67]</sup>。循此分层考察的思路开展更多研究，不仅有利于加深对“考古学文化”这一在中国当前考古学研究中仍占有突出重要地位的概念的理解，也有

利于推动中国社会考古研究的深入和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进一步转变,更好揭示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与历史的真实<sup>[68]</sup>。

## 五、结语

东周以降,周王室力量衰微,具有鲜明特色的地域文化逐渐形成,本文所论的浅腹矮足平盖鼎也是这种地域文化的构成要素,集中分布于晋南、豫东和鲁西南地区。它以独特的形制、装饰与其他青铜鼎相区别,形成了独特的整体风格;但根据形制、装饰的细节特征,此类青铜鼎又可以划分为不同的型和亚型,不同型的浅腹矮足平盖鼎之间也存在一定的文化交流现象。结合青铜鼎的风格特征、空间分布、考古背景、铸造工艺等方面的信息,可以推断,A、B两型浅腹矮足平盖鼎,产地应该存在区别——A型浅腹矮足平

盖鼎的产地应为薛国或宋国,B型浅腹矮足平盖鼎的产地为晋国的可能性最大。

通过浅腹矮足平盖鼎风格分析与产地探讨可以发现,东周时期主流青铜器铸造工艺随着时代的变迁发生演变,青铜鼎等形制复杂的青铜器,附件多采用分铸铸接的方法成形,但山东特别是鲁南、鲁东南地区,则较长时间延续了较早阶段的浑铸成形工艺。青铜器的风格、工艺、物料特征、来源存在空间上不对应的现象,各自形成的风格圈、工艺圈、物料圈及其基于物质遗存“许多特征的总和”而定义的考古学文化,是对不同层面物质文化现象的概括,与古代社会不同方面相联系。更多个案研究的开展,有利于加深对“考古学文化”这一概念的理解,进而推动相关研究的深入和中国考古学研究范式的转变,更好揭示古代社会经济生活的复杂性与古代历史的真实。

### 注 释

[1] 山东省济宁市文物管理局:《薛国故城勘查和墓葬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91年第4期。

[2] 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第1659页。下文春秋分期并从朱凤瀚先生,具体而言,春秋早期为公元前770~公元前670年,春秋中期为公元前670~公元前570年,春秋晚期为公元前570~公元前476年。参见上书第1651页。

[3] 山东博物馆、滕州市博物馆:《惟薛有序,于斯千年——古薛国历史文化展》,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2016年,第127页。

[4] 张连利等编:《山东淄博文物精粹》,山东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87页;淄博市临淄区文物管理局:《临淄文物志》,文物出版社,2015年,第151页;王春法主编:《海岱朝宗:山东古代文物菁华》,北

京时代华文书局,2019年,第139页。

[5] 枣庄市博物馆等:《山东枣庄徐楼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期;枣庄市博物馆等:《枣庄市峰城徐楼东周墓葬发掘报告》,《海岱考古(第七辑)》,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59~127页。

[6] 陈佩芬:《夏商周青铜器研究·东周篇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120~121页。

[7] 董莲池:《释辵马亥鼎铭中的“市”字》,《第三届中日韩(CJK)汉字文化国际论坛论文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131~134页。

[8]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青铜器全集8(东周2)》,文物出版社,1995年,第8页;赵瑞民、韩炳华:《晋系青铜器研究: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1976年闻喜上郭村周

代墓葬清理记》，《三晋考古（第一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23~138页。

[10] 嘉父山考古队：《嘉父山墓地发掘收获》，《文物世界》2009年第6期。

[11]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的两座春秋时期墓葬》，《考古》2017年第5期；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的五座铜器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0期；临汾市博物馆等：《山右吉金：隰县瓦窑坡东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

[12]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东周墓（M8830）》，《文物》2011年第8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西工区M8832号东周墓》，《考古》2011年第9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3、44、76、77页。

[13]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陕西凤翔孙家南头春秋秦墓发掘简报》，《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4期；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工作队、凤翔县博物馆：《凤翔孙家南头：周秦墓葬与西汉仓储建筑遗址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71页。

[14] 陈平：《再读滕固——近代“新史学”视野下的滕固美术史撰述》，《滕固美术史论著三种》，商务印书馆，2011年，第247~270页。

[15] [英] 罗伯特·莱顿著、王红译、王建民审校：《艺术人类学》，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61页。

[16] 陈芳妹：《艺术史学与考古学的交会——殷商青铜器艺术史研究方法的省思》，《学术史与方法学的省思——“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七十周年研讨会论文集》，历史语言研究所，2000年，第181~248页；苏荣誉：《中国青铜技术与艺术（丁酉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张昌平：《商周时期南方青铜器研究》，商务印书馆，2016年；白云

翔：《论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考古》2016年第9期；曹大志：《青铜器产地与风格分析——来自黄土丘陵的三个案例》，《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郎剑锋：《东周吴越式青铜盖鼎刍议》，《考古》2022年第2期。

[17] 赵瑞民、韩炳华：《晋系青铜器研究：类型学与文化因素分析》，山西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6页。

[18] 路国权：《东周青铜容器谱系研究（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8年，第522页。

[19] 毕经纬：《问道于器：海岱地区商周青铜器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66页。

[20] 毕经纬、孙战伟：《融合与固守——鲁南东周铜器墓复杂性解析》，《华夏考古》2018年第1期。

[21] 张洁、刘艳菲：《淮河流域东周墓葬出土青铜器初步研究》，《江汉考古》2022年第5期。

[22]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的两座春秋时期墓葬》，《考古》2017年第5期。

[23] 本文所用线图及照片为未完全修复状态，三矩形钮未体现。

[24] 发掘报告未发表口径数据，后经实物测量。

[25] 同[17]。

[26] 同[18]。

[27] 同[21]。

[28] 白云翔：《论基于风格与分布的考古遗物产地推定法》，《考古》2016年第9期。

[29] 同[28]。

[30] 曹大志：《青铜器产地与风格分析——来自黄土丘陵的三个案例》，《南方文物》2019年第5期。

[31] 黎海超、崔剑锋、王竑、任周方：《论疆国本地风格铜器的生产问题》，《考古》2020年第1期；黎海超、崔剑锋、周志清、左志强：《科技视野下“异族同俗”现象的观察——以巴蜀青铜器为例》，《考古》2021年第12期。

[32] 魏国锋、秦颖、胡雅丽、黄凤春、徐天进、

王昌燧:《利用泥芯中稀土元素示踪青铜器的产地》,《岩矿测试》2007年第2期;罗武干、秦颖、田建花、王昌燧:《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青铜器产地初步研究》,《土壤》2009年第4期;魏国锋、秦颖、姚政权、王昌燧、胡雅丽、黄凤春:《利用泥芯示踪九连墩楚墓青铜器的产地》,《岩石矿物学杂志》2011年第4期。

[33] 同 [28]。

[34]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洛阳市西工区M8832号东周墓》,《考古》2011年第9期;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4、46页。

[35] 同 [20]。

[36]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收藏。

[37] 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文物精粹·铜器卷》,文物出版社,2021年,第102页。

[38] 郑西溪主编:《临沂市博物馆馆藏集粹》,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年,第79页。

[39] 烟台市博物馆、海阳市博物馆:《海阳嘴子前》,齐鲁书社,2002年,第53、54页。

[40] 齐文化博物馆收藏。

[41] 山西省考古研究院等:《山右吉金:襄汾陶寺北两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56、57页;山西省考古研究院、临汾市文物局、襄汾县文化局:《山西襄汾陶寺北墓地的两座春秋墓葬》,《中原文物》2023年第1期。

[42] 枣庄市博物馆等:《山东枣庄徐楼东周墓发掘简报》,《文物》2014年第1期。

[43] 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5(山东上)》,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第220页。

[44] 李伯谦主编:《中国出土青铜器全集5(山东上)》,科学出版社、龙门书局,2018年,第236页。

[45]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44页。

[46] 张连利等编:《山东淄博文物精粹》,山东

画报出版社,2002年,第87页。

[47] 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体育场路西东周墓发掘报告》,文物出版社,2011年,第77页。

[48] 南普恒、王晓毅、潜伟、李延祥:《瓦窑坡墓地M29、M30出土铜器的技术特征及相关问题》,《考古》2017年第5期;临汾市博物馆、隰县文物旅游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右吉金:隰县瓦窑坡东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38页。

[49] 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等:《山西隰县瓦窑坡墓地的五座铜器墓》,《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年第10期。

[50] 临汾市博物馆、隰县文物旅游局、山西省考古研究院:《山右吉金:隰县瓦窑坡东周墓地出土青铜器精粹》,山西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2~11页。

[51] 同 [10]。

[52] 同 [9]。

[53] 苏荣誉、华觉明、李克敏、卢本珊:《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87页。

[54] 郭宝钧:《商周铜器群综合研究》,文物出版社,1981年,第126~127页;苏荣誉、华觉明、李克敏、卢本珊:《中国上古金属技术》,山东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年,第179页。

[55] 赵世纲:《浙川下寺春秋墓青铜器铸造工艺》,《浙川下寺春秋楚墓》,文物出版社,1991年,第379~388页;吴坤仪:《当阳赵家湖楚墓青铜器铸造工艺》,《当阳赵家湖楚墓》,文物出版社,1992年,第257~265页;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等:《临猗程村墓地》,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3年,第259~263页。近年相关研究成果较多,不备举。

[56] 丁昊阳:《莒国东周青铜器研究——以沂水刘家店子和纪王崮出土青铜器为中心》,山东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22年。

[57]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与博物馆学系:



《山东济南长清仙人台周代墓地 M4 发掘简报》，《文物》2019 年第 4 期。

[58] 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考古系：《长清仙人台五号墓发掘简报》，《文物》1998 年第 9 期。

[59] 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7 年；朱凤瀚：《中国青铜器综论（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年，第 1708、1719 页。需要指出的是，《临沂凤凰岭东周墓·后记》中提及，“有人认为是莒国的墓葬”；朱凤瀚先生表示认同，认为“墓葬与莒南大店 M2 多相近处，特别是上面曾说明成组鼎的构成（大小、形制一致）、立耳鼎至此时仍存在等特征，亦见于同期莒国墓葬，加之莒国墓葬既已葬于莒南大店，与凤凰岭所在亦仅数十华里，所以亦学者提出此墓是莒国贵族墓葬，也并非没有道理”。“其国别问题，尚未能肯定，亦将此墓出土铜器暂附于莒国铜器后，以待再考。”笔者认为，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青铜鼎等随葬青铜器的形制、装饰与沂水刘家店子、纪王崮莒公墓存在一定的差异，且青铜鼎的铸造工艺有异，当非莒国墓葬，故从邠墓之说。

[60] 郎剑锋：《东周吴越式青铜盖鼎刍议》，《考古》2022 年第 2 期。

[61] 山东省兖石铁路文物考古工作队：《临沂凤凰岭东周墓》，齐鲁书社，1987 年，第 8 页，图版七，1；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文物精粹·铜器卷》，文物出版社，2021 年，第 95 页。《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文物精粹·铜器卷》误认为该鼎出土于沂水刘家店子 1 号墓，需要注意。

[62] 同 [60]。

[63] 刘彦琪：《甘肃礼县出土扁球形附耳鼎的浑铸与水平分型技术——兼论技术对造型设计的影响》，《四川文物》2023 年第 2 期。

[64] 张吉、陈建立：《东周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17 年第 2 期；张吉：《东周青铜器的资源与技术——以汉淮地区为中心》，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 年；张吉、孙波、郝导华、吕承佳：《山东滕州薛国故城出土部分青铜器的时代及科学分析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0 年第 10 期；张吉、郜向平、丁思聪、赵昊、陈建立：《河南蒙阳官庄遗址铸铜技术与金属资源变迁初步研究》，《南方文物》2021 年第 3 期；郝导华、张吉、杜晓军、黄宝玲、陈建立：《山东昌乐都北墓地出土东周青铜器的分析研究》，《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21 年第 6 期；赵凤燕、郎剑锋、任相宏、李秀辉、张吉、陈建立：《长清仙人台墓地出土青铜器铅同位素比值的初步分析》，《南方文物》2022 年第 5 期。

[65] 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考古学》编辑委员会：《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年，第 253 页。

[66] 黎海超、崔剑锋、周志清、左志强：《科技视野下“异族同俗”现象的观察——以巴蜀青铜器为例》，《考古》2021 年第 12 期。

[67] 徐良高：《求真抑或建构——走出实证主义历史学与考古学》，科学出版社，2023 年，第 478、482 页。

[68] 陈胜前：《文化历史考古的理论反思：中国考古学的视角》，《考古》2018 年第 2 期。